

## 旅居或逗留：在澳大利亚的国际学者和研究人员

安东尼·韦尔奇

安东尼·韦尔奇 (Anthony Welch)：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University of Sydney) 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件：anthony.welch@sydney.edu.au

学生和教师的国际流动性普遍增加，虽然可能存在地区间的不均衡发展。移民国家和英语圈 (the Anglosphere, 即英语作为常用语言的国家) 仍然是主要的目的地，但一个更加多极化的知识世界意味着流动性更加多样化。传统上，中国香港地区接纳了许多国际学术人员，但最近这种情况开始改变。至少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中国的主要大学和领先的研究实验室吸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通常是通过许多外国人才计划。同样，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Max Planck Institutes, 其中部分研究所用英语工作) 也吸引了领先的国际研究人员，而新加坡也吸引了领先的学者，甚至有些团队一起去往了新加坡的大学。

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学术和研究人员队伍特别多样化，约 45% 的学术人员在海外出生。澳大利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和工作条件，以及优先考虑高技能水平的开放性移民计划，从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素质工作人员进入研究机构和大学。技术移民占该国移民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几年前，经合组织的研究将澳大利亚列为其成员国中人才净流入最多的国家。

### 亚洲的崛起

亚洲知识体系的兴起，以及澳大利亚作

为南太平洋地区唯一重要的英语高等教育体系的位置，确保了现在澳大利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越来越多的学术人员和科学家来自亚洲。在许多情况下，研究人员在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然后转入大学或研究机构。与总人口的增长同步，在 2005 年至 2015 年的十年间，在亚洲出生的澳大利亚学者的比例增长了 50% 以上，从 10% 增长到 15.4%。几乎三分之一的人来自中国大陆地区，还有 5% 来自中国香港地区。来自印度的学术人员现在占到了澳大利亚国际工作人员总数的 16%。但是，亚洲出生的工作人员的比例因学科不同而有很大差异，社会科学的比例最低，而 IT 和工程等领域的比例超过 30%。作者的研究结果显示，超过 75% 亚洲出生的学术人员与来自亚洲的学者合作，其中三分之二是在联合研究项目上。学者的原籍国尤其重要：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曾帮助发展与原籍国的合作交流项目。在中国出生的国际教师占据较高比例，这也促进了双边研究合作的提升。中国现在是一个国际知识强国，是澳大利亚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在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活跃的研究合作。中国也是本地区其他国家的主要知识伙伴，这为发展地区知识伙伴关系，包括中国出生的研究人员网络，提供了潜力。

## 有代表权，但认可有限

然而，大量亚洲出生的工作人员并不总是与成果或机构认可相匹配（比如在晋升过程中）。部分人叹息说，虽然他们的学科知识受到重视，但建立和维持国际合作的额外工作往往得不到认可。部分人还抱怨说，在访问潜在的国际合作者时，合作者对自己最初抱有的热情很少能够持续发展下去。语言是经常被他们提及的一个问题，而其中部分人表示他们的文化背景构成了一个不利因素。

亚洲出生的学者在高级的学术水平上的代表性也不足。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最低级别的工作人员中，有四分之一是亚洲出生的，但在最高级别（教授）中只有十分之一，而在副校长（副院长）级别中不到三分之一。与北美一样，在亚洲出生的女性学者经常面临额外的性别歧视。例如，在亚洲出生的女性学者在 IT 行业占据了 4.8% 的工程师职位，而她们的男性同行则占据了 28.5%。在信息技术领域，差距也很大：在亚洲出生的女学者占该领域工作人员总数的 9.4%，而她们的男性同龄人则占 25.1%。尽管如此，大量知识移民的兴起和增长是一种巨大的资源，这些移民包括来自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的移民，但也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这一资源构成了促进澳大利亚与亚洲研究系统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

## 新冠疫情带来的流动和网络的障碍

从 2020 年初开始，新冠疫情严重破坏了国际流动性，包括学术人员的流动性。当澳大利亚突然关闭其边境时，数以万计的国际学生被困在国外，无法返回澳大利亚学习。

数以千计的澳大利亚公民也滞留在国外，包括许多国际学者。印度裔澳大利亚公民受到威胁，如果他们试图返回澳大利亚，将被处以巨额罚款。直到最近，国际边界才重新开放。国际旅行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包括前往中国，这对国际学术人员的活动形成了持续的限制，特别是那些需要在国外进行实地考察的人员。

## 美中关系

中美关系的日趋紧张，对在澳大利亚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的、在亚洲出生的学术人员构成了更多障碍。所谓的中美贸易战现在越来越被认为是一场技术战，甚至是一场文化战。这给具有潜在安全影响的高科技领域（如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新材料和机器人）的国际研究人员带来了特别的问题。即便是以中国为重点的社会科学同事也受到了影响，其中不少人是华裔。实施具有深远影响的外国干预立法和政策的整体安全化，使大学和科研机构有义务检查成千上万的国际协议。最近，联邦部长取消了国家研究机构已经授予的几项研究基金，这刺激了对政治干预的指控。与美国和英国一样，这些紧张关系导致了更多的反华甚至反亚裔的骚扰和歧视事件。许多在中国出生的同事表示感到焦虑，或者认为有必要低调行事，直到关系改善。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和研究系统仍然充满活力和多样性，国际学术人员做出了重大贡献。有些人已经离开；有些人将继续加入。未来几年将决定澳大利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国际学者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新冠疫情和中美文化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政策安全化的制约。